

辞书出版与文化积累

——从新疆人民出版社辞书出版谈起

贺灵

辞书出版是一项艰巨、复杂、细致的出版工作，具有很强的科学性、技术性和专业性，也是一项需要专门知识的工作，来不得半点疏忽，否则往往出现前功尽弃的现象。而编纂辞书，自古被认为是“吃苦不讨好”的工作，因为其知识容量、细致谨慎程度、精力和时间的耗费以及词条的准确性和语言表述的精练等等，都是其他研究工作和创作活动所无可比拟的。另外，其编排方面的科学性和专业化劳动，是一项艰巨而细致的工作。但是，辞书不同于其他著作，其知识含量高，是某一学科知识的高度积累，而且，其每一词条的知识都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和权威性。一部合格的辞书，奉献给读者的是定型化的工具性知识，其价值在于被人们反复使用，反复查阅，在读者之中确立“惟我独尊”的地位。我国改革开放后，才真正形成了自己的辞书学领域。

辞书大致分为三个大类：社会科学类、自然科学类和综合类。无论社会科学类还是自然科学类，每一学科及其分支学科均有知识（文化）积累的问题，当知识积累达到一定的程度，就可以用编纂辞书的方式进行记录和保存。因而某一学科辞书的编纂出版，是该学科资料和研究达到成熟的标志，否则，该辞书的知识性、资料性和实用性将大打折扣。

新疆人民出版社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出版工作中，各文种辞书的出版占有较重要的地位，可以说成就显著，为我区各部门的文化积累做出了较大贡献。据统计，自1953—2005年，本社出版包括维吾尔、汉、哈萨克、蒙古、柯尔克孜和锡伯六个文种辞书130多种，其中语言类40多种，社科类20种，科技类20种，农牧类10多种，经济类5种，哲学类4种，文学类4种，法律类3种，其他10多种，租型1种多次印刷。另外，出版近30多种准辞书性质的“词汇对照”、“手册”等。

新疆人民出版社的辞书出版，实际上只有20年的历史。这是因为由辞书的性质所决定。1980年以前只有几种语言类辞书出版。1953年本社第一部辞书、包尔汉编译的《维汉俄辞典》出版发行，受到读者的广泛欢迎。10年后第二部辞书《汉维简明词典》编译出版。又过11年即1974年第三部词典《汉维词典》（试编本）出版。1979年本社编译的第四部辞书《汉哈辞典》出版发行。为何近30年只有几部辞书出版，而且都集中于语言类？这是因为，新中国成立后的30年，是经济、文化打基础的阶段，而且期间的十余年，极“左”思潮泛滥，严重破坏了正常的出版秩序，文化建设严重倒退，根本谈不上知识性和文化积累性图书的出版。文化大革命以前，自治区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研究方面刚刚起步，谈不上文化积累，社会上也无这方面的需求。但在语言文字方面，新中国成立后，推翻了数千年来延续下来的民族压迫和歧视制度，逐步建立起了新型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汉族与各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各少数民族对汉族历史、文化的了解日甚一日，要求广泛的语言沟通和文化交流，语言辞书日益成为必需的工具，因此，80年代以前的数部语言工具书就是适应这一要求问世的。这几部辞书的出版，为以后工具书的编纂出版积累了一定的经验。

20世纪80年代以后，根据社会需要，本社开始重视有关辞书的组稿、编纂

和出版工作,维吾尔文等编辑部专门设立辞书编辑室,调入这方面有专长的懂维、汉、俄数种语言的维吾尔、哈萨克和汉族编辑,从事编纂辞书的业务,近20年中,平均每年以超过五部的速度出版不同文种的各类辞书。80年代前五年,仍以语言工具书为主。出版了《哈汉词典》、《突厥语大词典》(1—3)、《维汉词典》、《常用词语三用词典》(汉文,租型)、《维吾尔成语词典》、《维吾尔熟语详解词典》、《现代维吾尔文学语言正字词典》、《汉哈语言学名词术语对照小词典》、《达斡尔哈萨克汉语对照词典》等。其中的《现代维吾尔文学语言正字词典》是自治区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的科研成果,这证明我区少数民族语言规范和研究工作适应文化的发展有了进一步深入。另外,这几年,其他学科辞书的编纂工作也起步,1984年出版维吾尔文版《政治经济学词典》、《汉维测绘词典》、《哈拉汉植物学词典》等。说明本社少数民族语种工具书的编纂向专业化、多学科方向迈进。

80年代中期后,在文教卫生、农牧科技、财经、科研等系统,维汉、哈汉、蒙汉、锡汉等双语或多语使用现象已很普遍,少数民族读者对汉文出版物的阅读能力大大提高,因此迫切需要这些方面的工具书。针对这种需求,本社在做辞书选题时,在通过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拓宽选题范围,增加品种,加大出版力度,自1986—1990年的五年期间,安排出版不同文种各门类辞书35种左右。出现了本社辞书出版的第一个高峰期。在这数十种辞书中,许多为自汉文对译的辞书,这为少数民族读者阅读汉文读物带来了方便。自从高考制度恢复以后,自治区各大专院校课程开设范围逐年扩大,各民族学生对各类工具书的需求量也越来越大,因此,本社加大了面向大中专学生用工具书的选题,几年中收到了较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从出版的数十个品种中就可以看出其多样性和侧重点转移的情况,如1986年出版《汉维体育词典》、《汉维数学词典》、《汉维化学词典》、《汉维生物词典》、《汉哈词典》、《哈汉谚语词典》、《哈萨克语正字法词典》;1987年出版《法律小词典》(哈萨克文)、《锡伯(满)语词典》、《旧清语词典》;1988年出版《汉维财经词典》、《英维词典》、《汉维电工词典》、维吾尔文种《法律小词典》、哈萨克文种《理论学习小词典》;1989年出版维吾尔文种《外国哲学家简介词典》、《汉维词典》(1—2)、《汉维科技词典》、《哈萨克语详解词典》(1—3)、《汉锡简明对照词典》、《柯尔克孜语正字法词典》;1990年出版维吾尔文种《会计词典》、《小学生汉维词典》、《汉英维成语词典》、《中学生汉维词典》、《汉维历史词典》、《新疆汉语方言词典》、《蒙古语常用词汇》、《哈萨克成语词典》、《哈萨克语详解词典》(4—6)、锡伯文《六部成语词典》。这一时期,各文种辞书中,各民族专家学者自己编纂的分量有所增加,这是各民族科研和创作水平进一步提高的重要标志,也是各民族文化发展和知识积累增强的有力证明。

1991—1994年,本社辞书出版的强劲势头仍未减弱,反而又有所增强,从选题范围和品种来看,这四年是本社工具书编纂出版的顶峰时期。这一时期,汉文版陆续推出了数部深受读者欢迎的社科类词典,其知识含量和文化积累性可谓首屈一指,如1993年出版《新疆历史词典》、《回族知识词典》、《中国丝绸之路辞典》、《中国专家人名辞典》(新疆卷)。其他文种四年中推出了近40个品种,可谓成绩显著。从门类来看,辞书涉及的学科范围更有扩大,本民族专家和学者编纂的份量又有加大。如1991年出版维吾尔文种《工资福利词典》、《简明数学辞典》、《哈萨克语详解词典》(7—10);1992年出版维吾尔文种《小学语言详解辞典》、《世界地名解释词典》、《汉维畜牧兽医词典》、《汉维教育学词典》、柯尔克孜文《简明文学学术语词典》;1993年出版维吾尔文《简明物理学词典》、《汉维

公安司法词典》、《维英词典》、《汉维英生物化学词典》、《简明政治经济学词典》（维吾尔文）、《汉维袖珍词典》、《汉维化工解释词典》、《简明阿拉伯语维吾尔语词典》、哈萨克文《数学词典》和《化学词典》、锡伯文《单清语词典》等；1994年出版《新满汉大词典》、《汉维拉动物名称词典》、哈萨克文《畜牧兽医小词典》、《汉维世界民族译名词典》、《满汉词典》、维吾尔文版《伊斯兰教词典》、《汉维新华字典》、哈萨克文《数学词典》、《现代锡伯文学语言正字词典》等。从上可以看出，1994年是本社有史以来辞书出版最多的一年，也是辞书出版高峰期的结束。

1995年以后，由于计划经济体制开始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本社辞书出版开始受种种条件的限制，出现严重滑坡。自1995—2003年底，六种文字出版的辞书才10余种，如1995年出版汉文版《新疆民族辞典》、《汉维园艺词典》；1996年出版维吾尔文版《文学词典》和《文学描写辞典》（上、下）、《简明中国战争辞典》等；1998年汉文出版《西北民族词典》；1999和2000年出版数种学生用辞典和《汉哈简明辞典》；2002年汉文出版《西域地名词典》。这几年作为选题上了不少有价值的辞书，如：汉文的《西域人文词典》、《西域文学艺术词典》、《突厥语大词典》等；维吾尔文的《俄维词典》、《土汉维词典》、《魔鬼词典》、《汉维宗教词典》、《维吾尔语反义词词典》等；锡伯文的《汉锡词典》等。其中有的正在编纂，但多数将胎死腹中。

辞书编纂一是大量耗费精力，二是耗费时间，尤其是文化含量较高的大型工具书更是如此。如《维汉词典》、《汉维词典》、《哈汉词典》、《突厥语大词典》、《新满汉大词典》、《新疆历史词典》等，都是文化含量比较高的辞书。其中的不少辞书，参加编纂人员达四五十人之多，耗时十几年时间。如《新满汉大词典》1976年立项，之后聘请新疆专家学者十余人，与北京学者十余人共同编纂，前后耗时18年时间，于1994年才得以出版。又如《汉维词典》和《汉哈词典》也前后耗时十几年或二十几年不等。

总结新疆人民出版社二十余年辞书出版的历史，可以得出如下认识：第一，维吾尔文和哈萨克文编辑部在专业人员少，资金困难，基本缺乏辞书编纂经验的条件下，与汉族专业人员紧密配合，以十年磨一剑的精神，较好地完成了基础性建设，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益，尤其是在语言类和科技类辞书编纂方面积累了大量可贵经验，而且取得的成绩尤为显著。第二，本社各文种辞书的质量，是逐步得以提高的，而且其品种由单一到多门类，也是渐渐拓宽的，我社成为全疆各文种辞书出版的中心。第三，本社通过辞书编纂出版，文化积累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尤其是各文种语言类和社科类辞书，其知识含量和文化积累可谓首屈一指，成为本社的拳头产品。